

【跟大师学国学】

吕思勉

三国史话

吕思勉 著



得也。在通史中，
 可以教人，
 也。不徒然，
 地理，
 在內，
 者，
 史，
 其，

中华书局

【跟大师学国学】

三 国 史 话

吕思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史话/吕思勉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5
(跟大师学国学)

ISBN 978-7-101-06689-0

I. 三… II. 吕… III. 中国—古代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723 号

-
- 书 名 三国史话
著 者 吕思勉
丛 书 名 跟大师学国学
责任编辑 丛 绿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10 千字
-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689-0
定 价 16.00 元
-

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跟大师学国学”出版缘起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国学”之名，始自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我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其价值自不待言。

遗憾的是，出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错漏杂见，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饗读者。

这些作品，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借此机会，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

这些作品，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如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如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和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所写的通

俗读物，如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

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

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9年4月

大师说史 兴味悠长

张耕华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为“新史学”而倡导“史学革命”,其方向之一就是变史学的“帝王之学”为“为国民写史”。所谓“为国民写史”,不仅是历史写给国民看,还是历史要为国民写。百余年来,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就“为国民写史”而言,离“新史学”追求之目标还相差甚远。由电视台“名家讲座”而带来的“品三国”热潮,以及报上对怎样说史的讨论,都不妨看作学术界为“为国民写史”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思考。近日,中华书局重印史学家吕

思勉先生所写的《三国史话》，可以为学界当下的尝试和思考提供借鉴。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苏北游击区的江苏文化社，组织编辑部筹划出版图书刊物。已故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当时在编辑部工作，便约请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先生来写一本历史通俗读物。吕先生想，要写历史通俗读物，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是最佳的素材；因为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大都来自《三国演义》，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人们从中获取的历史知识，或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造成许多谬误；而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历史，既可纠正人们历史观念和知识上的谬误，也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吕先生的《三国史话》，实在是他《秦汉史》的副产品，融入许多他独特的研究心得。此次出版，附录中还收录了吕先生有关三国历史的20篇札记。读者如能将这些札记与《史话》的叙述相互对照，或进而再读他的《秦汉史》，就可以体会史家“说史”与演义体的历史小说大不相同。

说史如“烹调”，评话家、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一定要多加“佐料”；史学家追求历史的“原汁原味”，不仅不能多用“调料”，还要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细加甄别。吕先生说：“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我以为：纠正错误的历史知识；

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说点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是这本《三国史话》的三大特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需要纠正的历史谬误甚多，第一号需要辩诬的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记得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曾撰文为曹操“平反”，说曹操的所作所为实在继承了黄巾起义的未竟之业，结果引起了好多批评的意见。其实，吕先生为魏武帝的辩诬比郭先生早了二十多年，且立论、视角都不相同。吕先生说：政治本不是好事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要些阴谋诡计，原也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手腕，我们正不必以此来评说他的是非功过。曹操在五十多岁时曾写过一篇类似“自述”的《己亥令》，其中说道：（有人说我要篡汉），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去，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失败，国家也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吕先生说：读曹操的《己亥令》，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历来的英雄，“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谁能像曹操这般老实坦白呢？而将他视为奸臣，则是受《三国演义》和说书人的影响。

其实，不光《三国演义》所叙的史事谬误甚多，就是《三国志》的记载也有错误和不实，诸如此类的辩诬、纠错、求真，在这本《三国史话》里甚多：如曹操攻陶谦是否是为父报仇？孙策渡江袭击许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赤壁之战时孙权、周瑜、鲁肃何以决心抵抗曹

操？魏延的将略以及谋反降魏的真相？钟会是司马昭之心腹，何以有反司马昭的野心？附录中的《诸葛亮南征考》，专考《汉晋春秋》有关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的记载，作者认为：“攻心攻城，心战兵战，后世侈为美谈，其实不中情实。”“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粗安粗定，自系本怀。一出未能救平，原不足为亮病，必欲崇以虚辞，转殆致讥失实矣。”

《三国演义》的叙事，凡事好像都有“定数似的”，说兵谋、论军事，也总是说得“如有神算”、“似有天助”。其实，天底下的事哪有这般简单呢？吕先生的这本《三国史话》，看似平常无奇，其背后都有他一番求索考订的功夫，尤其是要纠正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观念，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如论者多说，曹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吕先生则认为主要“还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关系甚小。书中说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再如官渡之战，通常都说曹操是以少胜多，这自然也是事实。不过此役曹操也是孤注一掷，其兵谋也并非如《三国演义》所说的那样“成竹在胸”。建安五年四月，曹操虽击斩颜良、文丑，然并未伤及袁绍的主力。其后，两军相持四个月，袁氏充分利用持久之计，至八月才发起进攻，以至曹操军粮垂尽，兵势危急，写信给后方的荀彧，想要退兵回许昌了。幸亏荀彧力主不可退却。曹操带五千兵偷袭屯守鸟巢的淳于琼，实也是“舍死忘生，拼个孤注一掷”。至于官渡战后，形势虽变为南强北弱，但要“说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举而扫荡袁绍，那还是不够的”。曹操破

陶谦、吕布、袁术等，前后不过两三年；而袁曹交兵，前后共历九年，可见“袁绍确是曹操的一个劲敌”。

吕先生说史，富有大局观，而不斤斤于无关宏旨的情节渲染。书中说关羽之败虽与其“刚愎而贪攻”有关，然“通观前后”，刘备的心计太工和急于并吞刘璋不能不说是一个远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于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至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抗关中的，却变做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书中说后汉的动乱，特地指出这与西凉兵的强悍和凉州一带民风好乱有关，而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其中实含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

我们估量一个人懂不懂历史，往往以知道、记得史事的多少为标准，这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过去的史事，总要今人细心去体会才会觉得有意义、有用处。光以记得多少来衡量，实也不能算是懂得历史。黄仁宇先生曾说：“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中国大历史》》同样，说史者如不厌其烦地探究清圣祖是“传位十四子”还是“传位于四子”，总想借此说

明一点道理吧，否则如“昨夜邻人猫生子”一样，记述它又有何益呢？所以，通过史事来说明事理，也是吕先生说史的一个目的。

比如，西汉所设的刺史，是专门用来监督太守一级行政官的，他们官位比太守底，资格比太守浅。用小官去治大官，这且不颠倒了政治上的秩序？当时人因此而有一番“刺史该不该改州牧”的议论（改为州牧，就算是大守的上级官，可用资历较深的人去担任）。这些历史上的制度和议论，对于二千多年后的今人，有何价值和意义呢？吕先生说：西汉的刺史设置，仍有相当的价值，而当时人的议论则不足取；因为，行政与监督本为两个系统，“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督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的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督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以现在的事情来比喻：“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

又如汉代的外戚问题，吕先生也有一番论述。他说：封建宗室，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至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累了长久的经验，所以后来就不行封建了。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其时经验尚浅，以至于前汉为外戚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到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

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读吕先生的史著史论,我们知道他特别推崇先秦至西汉的社会改革思想和议论,他认为:与其责怪身居其位之人,倒不如反省检讨社会制度之不善;不改革社会制度之不善,而专责人在恶制度下之为善,不可得矣。(吕思勉:《中国现阶段文化的特征》,原刊《中美日报》1940年4月5日)

总之,《三国史话》的写法和特色,对我们今天写历史通俗读物和普及历史知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与七八十年前相比,当代的青年学生、职员白领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从课堂上、教材中获得的,离开学校之后,很少还会正儿八经地去阅读严肃的历史书,甚至《三国演义》也少有问津。他们所知的三国故事,往往还不是从《三国演义》那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电视、甚至网络上的“三国”游戏,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赵子龙的武功、诸葛亮的智商、刘备的人脉……回到上文所说:说史如“烹调”,怎么“烹调”出大众欢迎、“吃”了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历史“菜肴”呢?这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目 录

大师说史 兴味悠长(张耕华)	1
楔 子	1
宦 官	5
外 戚	13
黄 巾	21
历史和文学	29
后汉的地理	33
董卓的扰乱	39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49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61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67
赤壁之战的真相	77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87
替魏武帝辨诬	99
从曹操到司马懿	109

替魏延辨诬	115
姜维和钟会	123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131
司马懿如何人	137
司马氏之兴亡	143
晋代豪门斗富	149

附 录

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	154
袁曹成败	167
论魏武帝	172
曹嵩之死	175
诸葛亮南征考	176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180
奖率三军,臣职是当	184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185
马 钧	185
关羽欲杀曹公	186
李 邈	187
姜维不速救成都	188
孙策欲袭许	189

边章、韩遂	192
张纯之叛	193
君与王之别	194
罢社	196
吞泥	196
三国之校事	196
山越	199
后记(李永圻 张耕华)	207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

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他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